

目 录

回忆先父吴禄贞·····	吴忠华 (1)
吴禄贞先生生平业绩·····	傅光培 (13)
回忆蒋作宾先生·····	汤润琼 (29)
先父蒋作宾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	蒋硕健 (40)
忆蒋作宾先生任德、奥公使的几件事·····	胡天石 (47)
我对汉俊的点滴回忆·····	薛文淑 (49)
回忆我父亲李汉俊烈士·····	李声馥 (57)
王世杰家世·····	王和林等 (62)
我所知道的王世杰先生一家·····	杨静远 (73)
我所知道的王世杰·····	皮公亮 (76)
回忆堂叔王世杰二三事·····	王和林 (80)
王世杰对家乡的关怀·····	王文藻 (84)
回忆我的丈夫李范一·····	吴 璞 (87)
李范一先生事迹片断·····	范仲文、刘连江 (104)
学界先驱谈锡恩·····	朱贡西 (114)
师尊谈锡恩事略·····	郑万选 (118)
忆述谈锡恩先生·····	谈 瀛 (128)
谈锡恩对图书事业的卓著贡献·····	陈小平 (137)

回忆许莹璉同学的一些情况·····	梁漱溪(144)
怀念湖北乡村建设创导者许莹璉·····	胡起祥(145)
许以善言行实政 莹将光洁励廉偶 ——忆述许莹璉先生·····	谈 瀛(155)
怀念先父瞿干琴·····	瞿 琳(165)
回忆晏道刚先生·····	刘鸣皋(177)
回忆在雷法章先生身边的几年·····	王明璿(183)
记黄建中先生·····	顾学颀(194)
熊十力轶事·····	包惠僧(202)
湖北科技精英——我的父亲朱裕璧 ·····	朱宜莲、朱宜萱(212)
对朱贡西先生关于“武汉解放前大公中学的革命活动” 一文的质疑·····	李建生、王书瑶(232)

回忆先父吴禄贞

吴 志 华

我今年已是81岁的人了。父亲辛亥殉难已74年，然而父亲的音容和许许多多往事，仍时常浮现脑际，对他的思念之情也一直很深很深。

幼年时期的父亲

我父亲于1880年3月6日出生在湖北省云梦县吴家台子的一个穷读书人家。我的曾祖父吴道亨，曾先后任湖北省黄陂、公安两县当过教谕（相当于后来的教育局长），一生两袖清风。我祖父吴利彬是个饱学的秀才，因为喜欢钻研当时不为人们所重视的格致之学——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所以不能在科举路上取得进展，一生主要以教书为业，早年奔走四方，暮年才定居武昌。父亲16岁时，饱经风霜的祖父就与世长辞了。祖父在世时，家中仅有两百多薄田（约合10亩），而且是兄弟所共有的产业。他去世后，祖母彭梅仙与伯祖父分了家，带着我父亲和叔父另立门户，过着清贫的日子。

我小时曾从祖母和其他长辈口中，听到一些关于父亲幼年时期的故事——

我父亲小时，是个相当顽皮的孩子，但正是从他的一些顽皮行为中，显示出他的聪明、好动、风趣、勇敢和机智的个性。

他七八岁时，与本家堂兄弟们一起，就读于本村私塾，教书

先生是本家一位伯父。他们那一辈叔伯兄弟共10人，他排行第三。一到下午后半晌，这位老三便常常不知去向。当别人向先生报告时，先生则说：“他走了就走了，他的书都会背了，你们谁也不许走，都好好给我背书！”

那么这位老三哪儿去了呢？有时是下田帮人插秧、车水去了；有时是上树摘果子或掏鸟窝去了；有时是下池塘游泳去了；也有时是同小朋友们舞拳弄棍去了。

说起插秧，他本事还不小呢。他人虽小动作却很麻利，常常是开始时与别人并排插，插着插着就把别人落下了。此时，他会不失时机地用秧苗把别人圈在中间，用云梦农民的话来说，就是捉了别人的“乌龟”，给别人吃“蒸笼”。

一次他又上树了，祖母听说后又急又气，于是拿了根竹竿赶到树下，举着竹竿吓唬他，要他快下树。谁知，他扑通一声，从树上跳入了树下的池塘，祖母更加担心了，用竹竿拍打水面，要他上岸。结果是祖母在东边赶，他游到西边，祖母到西边，他又游到别处，再过一会儿干脆连个人影儿也不见了，祖母吓坏了，只好放下竹竿央告他上来。原来他一猛子扎入水下了，听祖母说只要他上来，不打他了，一下就从祖母眼皮下钻出了水面。他约10岁时，祖母有一次回娘家，一去数日未归，他就找到了他外婆家，到了那儿才知道祖母已到武昌去找刚从外省回到武昌的祖父去了。当时，他并不知道他们在武昌的住址，只知道祖父的一位住在汉口的朋友的住址，他想找到此人定能找到自己的父母，他已多年未见祖父的面了，迫不及待地想见到自己的父亲，于是决定自己独自动身去武汉。云梦距武汉的水路相去200多里，当时交通又不便，加上他从未出过远门，身上又几乎分文无有，但这一切都难不住他。他终于设法搭了一条货船，先到汉口找到祖父的朋友，然后找到祖父母。这件事说明他从小就是一个知难而进的人。

少年时很有些“狂”

父亲十二三岁时，随祖父读书。一次祖父让他做诗，他竟脱口而出：“一拳打倒亚细亚，二脚踢翻欧罗巴……”。祖父一听，责怪他太狂了。其实，这种狂正可以说明他从小就有大志。当时中国正处在列强的侵略和吞食之下，父亲真恨不得把这些魑魅魍魉全赶走，使中国早日富强起来。

祖父常常为读书人改稿子，当时有些读书人写些八股文章，准备投到书局供编文选之用，总是求他修改润色。当祖父看到好文章时，往往不免称赞几句，父亲却不以为然，他无心走科举之路，所以也不欣赏那些八股文章。一次，听祖父夸某人的文章如何好，父亲就笑了笑说：“将来又多了一个大官的幕僚。”当然，这下少不了又要挨骂，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父亲当时对自己将来的生活道路，已经有所选择。

父亲当时除对诗、词比较爱好外，就是喜爱格致学，老缠着祖父教这方面的知识。后来，这方面的知识，对他学习军事无疑帮了很大的忙。他在湖北武备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成绩都是名列前茅。

他的“狂”还表现他决不迷信洋人。他在武备学堂学习时，教官都是从日本和德国请来的，课堂纪律十分严格。一次，一位日本教官给他们上几何课，在黑板上演算时，把题证错了。学生中年纪最小的父亲，竟不客气地从座位上起身走上讲台，对教官说：“你算错了！”接着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演算起来，使日本教官无言以对。这件事在学堂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不信鬼神

从前的人，大都相信鬼神，但父亲从不相信这一套，以胆大而出名。年轻的伙伴们常为此想办法吓唬他。

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同学们与他打赌，要他独自在深夜去大操场呆上几小时，据说那个大操场时常闹鬼。父亲欣然接受了挑战，夜里带子把马刀就独自一人去了。果然，半夜时从远处传来了阵阵怪叫声，犹如鬼哭狼嚎！接着两个“鬼怪”一蹦一跳地窜了过来。父亲立即拔出马刀，高声喝道：“是人还是鬼？我要砍了！”这一下，“鬼怪”立刻现了原形，赶紧求饶，原来是两个同学装的。

大约在他被派去日本学习之前，父亲曾抱着游戏和好奇的心理，参加过一次府县级的考试。当时的考场一般设在府学或县学里，考院的两侧，有许多两平方米的小“号舍”。考生通常头一天下午入场，入场后，即将大门加封，第二天才开门放出考生来。入夜时分，照例由一个差役敲着锣喊：“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气氛十分阴森可怕。相信迷信的人认为，鬼魂通常就在此时出没。那天夜里，父亲正在他的号子里准备写文章，突然，从外飞进来一样东西，他拾起来一看，是大半个梨，正好口渴，于是用小刀一削就吃了起来，还自语道：“这个鬼看来是报恩的！”门外的“鬼”见他还悠然自得地翘着二郎腿在那儿准备写文章，便伸手去抱他那只正好露在半截门帘外的脚。他毫不犹豫的一脚踢去，外边传来一声：“哎哟，我的妈呀！”他说：“鬼还有妈，我倒要看看。”原来又是熟人在试探他。

我们家住在北京大方家胡同时，曾把一位二十八九岁未嫁的堂姑姑接来同住。姑姑信佛，在后花园一间空房设了个佛堂。她知道父亲不信这些，所以老是避着他拜佛。一天，姑姑又去拜佛，还带了鲜果作供品，父亲发现后，也尾随进入。当他走进佛堂，看到那么些供果，伸手就拿了一个，擦擦就吃，还说：“哟，菩萨还吃这么好的东西，我也吃点儿。”

女儿、儿子都一样

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当时一般人中，是很严重的，父亲则不

是这样。

事有凑巧，母亲怀我的同时，姨娘也有了身孕，而且她们俩同一天生孩子。结果母亲早一个时辰生了我这个女儿，姨娘晚一个时辰生了一个儿子，这下我母亲心中未免感到有几分别扭。我父亲却愉快地说：“别看她是个姑娘，我的姑娘比儿子还要紧，将来要跟儿子一样受教育。”父亲虽早早离我们而去，母亲就按照他的遗愿来培养我们三姊妹，使我们都上了大学。

我从三岁起开始识字，家里为我请了一位老先生，每天教我几个字。刚去上课时，我很怕先生，一次，要小便也不敢说，竟尿了裤子。父亲知道这件事后，既感到好笑，又感到高兴，说我懂规矩，上课时不随便往外跑。后来送我上学的保姆，特向先生说明，先生以后就常问问我，是不是需要去小便。

我小时没像一般女孩那样穿过耳孔，也没有像当时其他女孩那样缠过足。本来奶奶曾哄我同意缠足，她说姑娘裹了脚穿鞋好看，哄得我让她们给裹上了。可太难受了，我自己把裹脚布解下来，扔到了一边。爸爸知道后，就宣布不要给我缠足，于是不但我的脚得救了，而且两个妹妹也不必受缠足之苦了。

我四岁时，曾随母亲去过延吉，还记得是坐牛车到的那儿。当时父亲任吉林边务帮办，正与日本人交涉延边的领土主权问题。边务督办公署的大印平时就放在母亲房中；父亲手下的人要用印时，就叫我送去取。我问：“你们是不是要那个讨米口袋？”因为印装在一个印袋内，袋子的大小正好与当时乞丐用的讨米口袋差不多。父亲听说此事后，捧腹大笑，还连声夸我说得好！四岁的孩子不懂官印的作用，本是平常事，但父亲却因此夸我，不正说明他根本没把那颗印放在眼里吗？

父亲是爱我们的。我还在襁褓中时，他下班归来，总要叫人把我抱去给他看看。他在家时，晚饭后必定抽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玩一会儿。一次，他举着弟弟玩，一失手，孩子掉了下来，如

果不是母亲抢上去接着，就会摔坏了，为此挨了母亲一顿埋怨。

全家最后一次照全家福的照片，是在他遇难前半年。按照惯例，多半是母亲抱孩子，而这张照片我母亲空着手，父亲却抱着三妹，我和弟弟一个站在他左边，一个站在他右边。照片上没有四妹，那时她正在母亲怀里，父女没见着面呀！

父亲虽然爱我们，却绝不迁就我们。我还清楚地记得发生在我六七岁时的一件事：那年祖母从南京为我买了一套蓝缎绣花衣裤，我十分喜爱，每逢出门就要穿它。一天，全家要出去看电影。那时电影刚从国外传入，看电影可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事。当天正赶上下雨，我还是坚持要穿那套蓝色花衣。父亲说会把衣服弄脏，不要穿了，可我使起性子来非穿不可，结果被父亲取消了我看电影的资格。这件事对我教育极大，以后再提什么要求时，都要考虑一下对不对，遇事也不敢那么任性了。

敬重老人

父亲小时虽说有点儿淘气，稍大后，对自己的父母和长辈，都是非常敬重的。祖父在父亲16岁那年，应邀去外地讲学，后来肺病犯了，归途中曾吃黄瓜解渴，临终前打嗝仍带黄瓜气昧。黄瓜与祖父的死就这样联系了起来。父亲由于怀念自己的父亲，竟从此不许黄瓜进吴家的门。

祖父死后，他对祖母格外孝顺，为分担家庭经济重担，他16岁就进织布局做工，后又投考新军。

我还记得他下班回家后，总是先到祖母房内，陪她说一阵话。当时祖母还不过50刚出头的人。身体又很硬朗，但父亲总是去搀扶她，或把她想要拿的东西送到她手中，伺候得很周到。

父亲被调到北京后，仍惦记着在云梦老家的伯父（我的伯祖父），先是他伯父做了皮袍寄回去，后来又攒下一笔钱，寄回去给老人盖房子。受他接济、照顾的长辈和亲戚还有很多。

仗义疏财，济人危难

父亲为人非常豪爽，遇到自己的朋友、同志有困难时，总是竭力相助，既不怕花钱，又不怕担风险。

慷慨解囊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后来有优厚的薪俸，但家庭生活过得并不宽裕，连一点积蓄也没有，他身后留下的是一笔银行欠款。

革命活动需要经费，他就捐助。例如他到北京后，知道了湖北的同志在武昌成立日知会，立即捐款；又如他在延吉时，筹集了千元之资，作为革命党人在东北的活动经费；有些被追捕的同志要逃往国外避难，他也资助；个别有为的年轻人，想出国深造，他就多方为之筹划，并为他们解决经济上的困难。

经他设法营救的革命同志，也是很多的。湖北日知会几个主要负责人，被捕后判了死刑，经他营救减了刑，使这些人绝处逢生。武昌首义后，除两人病死狱中外，都恢复了自由。

1910年，同盟会几个同志谋炸摄政王载沣，事败后，黄复生和汪兆铭两人被捕，要判死刑。他亲自出马找到肃亲王善耆晓以利害说：“京城到处有革命党，要是把这两人公开在菜市口杀头，只怕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威胁还真见效，加上他多方活动，又花了不少钱，这两个人始得减刑为终身监禁，到辛亥革命后获释。其实我父亲根本不认识这两个人。

去年，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周锡卿教授，携夫人来我家作客。他一再对我说：“我的父亲是吴老伯营救的，他在世时，常对我们谈及此事。如果不是吴老伯救了他的命，他在1909年就死了，哪能一直活到1964年。如果那样，也就没有我和我现在这一家大了。”他夫人补充道：“他们共有五个子女，十个孙子和外孙。”原来周先生的父亲叫周震麟，1903年时曾与黄兴同时在长沙西园明德学堂任教，这个学堂是一个革命据点，也是华兴会的

诞生地。我父亲与周老先生都参加了华兴会的筹备工作和成立大会，因而相识。1909年，周老先生在京师大学堂任教，当时清廷为舆论所迫，搞了一个所谓民主立宪预备会议，周老先生带学生前去旁听。为了戳穿其骗局，周在会场带头高呼口号，并向主席台投掷座椅，使全场大乱，周当场被捕。事后经父亲多方设法营救，周老先生始得脱离囹圄，重返故里。

百姓叫他吴青天

日俄战争后，日本吞并了朝鲜，又策划侵占我东北，于1907年派兵占领“间岛”——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他们打着保护韩民的幌子，强行设立军政机构，并向清政府提出保有领事裁判权和警察权等无理要求。父亲作为边务大臣，与日本政府的代表进行交涉，据理力争，使日军不得不退出侵占的地方，承认“间岛”是中国领土。

他在延吉工作的三年中（先为帮办，后为督办），不仅保住了这片土地，同时还办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如加强边防建设、办学校、修筑道路、发展生产等。他还有一个开发建设延边的宏伟计划，并写成了意见书。

清廷对他是不放心的，但对日交涉又非得用他不可，在“间岛协约”（《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签订后不久，赶紧以“经费支绌”为借口，将边务公署撤销，把他调回了北京。

父亲是1910年春回北京的，那年在母亲晒衣物时，我发现了几件不寻常的东西，那就是万民伞与万民衣。伞与衣的外层，满是一指多宽、两寸来长的缎条，五颜六色，每个条上都写有一个人名。我问母亲这是什么东西，她告诉我这叫万民伞、万民衣，是父亲离开延吉时乡亲们送的，还告诉我百姓称父亲为“吴青天”。他们舍不得父亲离去，但又留不住，只好以此来表达他们对父亲的爱戴。

延吉人民对父亲的感情是深厚的，第二年父亲遇难的噩耗传到延吉时，百姓纷纷痛哭流涕，并自发地组织起来为他开追悼会。直至今日，延吉人民还没有忘记他，还以各种方式为他举行纪念活动。

噩耗传来

1911年秋，父亲原筹划借清廷阅兵之机，举行秋操起义，结果秋操因武昌起义而中断，他于是积极寻找新的时机。当时他所辖的第六镇与张绍曾所辖的二十镇，是守卫清廷东西大门的两支主力。他说服同情革命的张绍曾与他联合行动，随后又说服了山西义军，共同组成了燕晋联军，决定于11月7日开始行动，直捣清廷的老窝——北京。就在他“誓犁虏廷，建不世勋”的前几个小时，敌人对他下毒手了！

当父亲筹划北方起义时，就悄悄把全家老小从北京转移到了天津，以免家人在北京遭到不测。父亲的驻地在石家庄，母亲时常派人出去打听他的消息。一天，我发现大人们神色异常，又听说什么“首级没有了”。原来是父亲被人暗杀了，这噩耗真如晴天霹雳！我知道再也见不到那么疼爱我的父亲时，就放声大哭，哭了整整一天，饭不吃茶不饮，母亲不得不强忍悲痛来劝慰我。

当时，我只有七周岁，弟弟四岁，三妹两岁，四妹是父亲遇难一周后出世的。从此我一下变成了“大人”，处处关心弟弟妹妹。一次表哥带我和弟弟去铁路边玩，突然有一列火车开来，在路轨上玩的弟弟吓呆了，我赶快去抱他，但他又胖又重，我哪里抱得动。我急中生智，按倒他，抱着他就地一滚，这才脱离了危险。弟妹们要是生了病，我会守在床边不肯离去。

1912年3月，在上海张园和山西太原，分别为父亲召开了追悼大会。上海的追悼大会是由黄兴等人发起的，会上宣读了孙中山先生和黄兴的祭文。1912年3月17日的上海《时报》，以头

版头条刊登了孙中山先生的祭文全文，祭文的开头是：“荆山楚水，磅礴精英，代有伟人，振我汉声。觥觥吴公，盖世之杰，雄图不展，捐軀殉国。”孙中山先生还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第一号抚恤令，决定对父亲以陆军例赐恤金，用以“宣示天下以不负忠烈之意”。

我还能记得一点儿去山西太原参加追悼会的情形。追悼会开得很隆重，参加的人数多达数万。母亲是带着我和弟弟去的，到达后就由当地特别指定的两位女教师陪伴我们。会场是设在露天，搭有好几个台子，中间一个大的主席台，母亲登台讲了话，还带着我们到别的台上去与各界代表们见面。

1913年11月7日，也就是父亲殉国的两周年忌日，他的墓在他遇难地石家庄火车站旁建成，外形为纪念塔式，墓碑上刻着“故燕晋联军大将军绶卿吴公之墓”，墓侧还建了一座两层楼的房屋，是凭吊楼，母亲带我和弟妹们去扫墓时，就住在那儿。

1982年，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将墓迁到市内风景秀丽的长安公园内，仍按当年原式样修建。这年清明时节，我们应邀参加了新墓落成后的扫墓仪式。我和弟弟忠黄（现居香港）、三妹忠敏携子女前往。1984年清明时，侨居美国的四妹忠瑛，也回国前往石家庄扫墓。

我们每次去石家庄，当地省、市领导都亲切接见我们，负责接待的同志照顾十分周到，使我们感到非常温暖。我深深体会到：父亲不仅属于我，更属于中国人民。

深明大义的母亲

我外祖父也是位读书人，母亲景静淑从小跟他读了不少书，后来成了一位非常贤慧的妇女。父亲的全部心思都用在革命事业上，伺候老人养育孩子的担子，都落在母亲的肩上。父亲当时可以说是高官厚禄什么都有了，一般的妇女大约就该劝丈夫保住这

些就够了，还革命干什么。但我母亲却从不这样，只是暗暗地为父亲担心。父亲去世得那样早，母亲独自侍奉老人和把孩子们培养成人，是不容易的。由于过度操劳，她只活了47岁，祖母反而在她之后去世。

母亲与父亲感情很好，相互尊重，闲暇时夫妻间也和和诗，填填词，别有一番情趣。父亲死后，她在与父亲的合影背后，题了两首诗，以寄思念之情。这张题诗的照片，放入一个匣内，匣放入父亲棺木随葬，她宣布从此不再写诗。

父亲死后，我们由天津移居上海，当时是乘船去的。当船进入黄浦江口时，突然一件出我们意料外的事发生了一一母亲纵身投入了黄浦江。原来母亲认为护送一家老小的任务她已完成，岸上有叔叔在接我们，又得了一笔革命同志捐赠的抚恤费用，生活有了指望，她可以放心地去追随父亲去了。幸亏船上及时发现，放下救生艇，把她救了上来，救她时，她还一再让别人别救她，后来在们我一家老小的央求下，她才断了此念。

我永远也忘不了母亲的恩情。“五·四”运动以前，女孩子上学阻力是很大的，母亲不顾一些亲友的反对，坚决送我上学。我14岁就入了北京女师大附中，以后又进了女师大。母亲曾对人说：“我没有万贯家财留给孩子，我要让他们读好书，这就是他们一辈子也用不完的财富。”这笔财富我们姐弟四人一直用到如今。

1916年初，袁世凯搞帝制复辟的消息传来后，母亲十分气愤，她说：“难道人（指父亲）就白死了不成！”母亲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因为父亲是为推翻帝制为民主革命而殉国的，历史的车轮岂能倒转？！另一面种种迹象表明，袁世凯正是暗杀父亲的元凶，岂能让这个卖国贼为所欲为！武昌起义后，为镇压起义军，清廷再次起用袁世凯，先是派他为钦差大臣，去武汉督师围剿义军，接着又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于是大耍其反革

命的两手把戏：一方面陈兵长江，向革命者要挟议和；另一方面挟制清帝退位，目的是他自己窃取大权。父亲筹划北方起义，既可解武汉之围，又可粉碎袁世凯的美梦，当时的形势就是“有吴无袁。”袁世凯视父亲为他实现阴谋的最大威胁，终于采取了卑鄙的暗杀手段。然而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数月后，袁世凯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丧了命！

父亲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然而他所梦寐以求民族解放和祖国的繁荣昌盛，终于在今天实现了，他的在天之灵一定是含笑九泉的！

1985年4月于厦门

（徐小玉 整理）

（云梦县政协提供）

吳祿貞先生生平業績

傅 光 培

投筆從戎

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衰微破敗，外侮日甚，國土任人宰割。年僅15歲的吳祿貞，因不堪麻布廠工頭的欺凌，憤而辭工投入武昌工兵營當兵，然官長待之如奴隸，亦無法忍受，乃遵嚴命應童子試。16歲時（1896年），湖北武備學堂開辦，祿貞毅然前往報名，但因未足18歲，且身軀矮小，學堂拒不收錄。祿貞当即陳書，略謂：“我祖父是優貢，父親是秀才，自己也是秀才，曾習童工，吃軍糧，略識詩文，粗知武術，現雖年僅二八，但志願投筆從戎，為的是救國雪耻……”。并賦詩一首：“開卷喜讀戰國策，濡筆愛草從軍賦，安得一戰定三韓，投筆從戎爭先赴。”其愛國熱情，直從筆端出。武備學堂總教習蔡錫勇閱后，至為驚詫，拍案叫好，急將吳文轉呈總督張之洞。張閱后，大加贊賞，乃破例准其入學，并傳令嘉獎，通曉文武學堂，以示提倡。時武備學堂由德國元帥興登堡任總教習（后曾出任德國總統），堂規極嚴，學生长進很快。

湖北武備學堂原定三年畢業后，送德國深造。丁酉年（1897年），日本派專使來華，胁迫直隸（今河北）、兩江、湖廣總督從武備學堂挑選學生40人，從書院學堂挑選40人到日本留學，以示“提携”。湖廣總督張之洞选派武備學堂學生吳祿貞、傅慈祥、劉百剛、萬廷獻、吳祖蔭、吳元澤等20人，另加書院數人，

去日就学。谁知武备学堂的这20人，都不愿前往，请见张之洞，声称：“日本是我国死敌，我们和倭寇不共戴天，不愿去日。”张之洞见后，严峻地告诫学生：“不去不行，大家想想，我国的维新，比日本要早30年，现今，我们海军、陆军数量远远超过日本，为什么日本却打败了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武器、战术不如人家嘛！”转而安抚地说：“你们不是读过《孙子兵法》么？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嘛！派你们去，就是为了‘知彼’，为了战胜他们！选派的你们20人，全是我最喜欢的门生，你们是肩负重任，重任在肩，不容犹豫。”待张之洞入内堂后，傅慈祥抢先说：“对！这回我们要学孙大圣，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摸清他的五脏六腑。”吴禄贞大笑说：“去！将来闹他个天翻地覆。”

留学日本

1898年春，吴禄贞被选派赴日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培养具有大和魂的武士道精神，对学生操练，极为严格，且处罚苛刻。不论是冰天雪地，炎天暑热，或狂风暴雨的时刻，都要赤膊短裤，进行翻、爬、滚、打，连皇太子也不能例外。中国留学生一般体质瘦弱，尤其是皇族子孙，对此苦不堪言。唯独吴禄贞，虽其身躯不够魁梧，然幼受“吴门神棍”传授，攀缘鱼跃，更是独树一帜，加以秉赋聪慧，勤奋刻苦，很快就成为个中佼佼，全校师生，刮目相看。

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前往神武庙（现改名为武道庙）观瞻，禄贞和同学们见东乡隆盛一副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架势，目睹陈列的掳掠我国的战利品，先是仰天长啸，感慨万千，继而与同学们一道，研讨日本与西欧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科学发达之原因，对照我国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激起他爱国义愤，从而更加勤学苦练，以伸雪耻报国之志。

大通举义

吴禄贞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之际，正值孙中山先生流亡日本，禄贞对孙中山“一见如故，倾倒备至”，常常走访，面聆中山先生讲述革命道理，并毅然加入兴中会，成为早期兴中会会员之一，后又加入同盟会。1900年，孙中山筹备惠州起义，要吴禄贞、傅慈祥等九人回国，并内定吴禄贞、傅慈祥主持长江流域起义，决定吴禄贞为大通前军统帅，傅慈祥为湖北中军统帅，孙武为岳州、新堤后军统帅，林圭为长沙统帅，唐才常为总粮台。孙中山为此在东京镰仓菜馆召开送别励志会选出的留学生回国请愿及林圭等回汉口筹备起义的大会。斯时，梁启超也参加了。

谁知林圭到达上海后，与唐才常一道，建立自立会，梁启超也突然从美国回到汉口，改变了镰仓会议决定，以自立会名义，宣布成立自立军，委派秦鼎怡（力山）为大通前军统帅，田邦浚为新堤右军统帅，林圭为汉口中军统帅。其实，当时唐才常、林圭、沈荃、陈犹龙、秦力山、田邦浚等人均在上海逗留。

吴禄贞从日本赶回武昌，会见黄忠浩、吴元恺及武穴管领黄海鳌、辜鸿恩、申吉三等后，即赴大通前沿，决定7月15日举事。岂料负责运送军火的师中吉（会党大龙头师襄）向清廷告密。吴禄贞获知后，果断决定提前两天发难，乃于7月13日，亲率缉私、水私、巡防诸营，占据大通厘金局、盐局，向芜湖清军展开血战。大通起义军勇猛异常，逼得两江总督刘坤一大呼青阳、芜湖、南陵、铜陵吃紧！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为之震动。大通起义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救援、孤军奋战七昼夜、伤亡数千的情况下失败，吴禄贞只身逃沪。

吴禄贞抵达上海后，见唐才常以自立会会长康有为的名义发布的“讨贼勤王请光绪帝复辟”的布告，大怒，知唐还在上海，乃寻至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家找到唐才常，捶桌斥责唐才常背信弃